

稳金融是产业升级和经济结构调整的基础

■ 李稻葵
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

我的观点非常简单，现在国家提出十三五初期的五大任务，我认为完成这五大任务的基础就是稳金融。中国经济到了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，那么这一轮的转型升级与上个世纪末、本世纪初和 90 年有一点根本的不同，就是金融与实体经济之间交互的关系非常明显。

我有两个基本的判断。一个基本判断，中国金融总体的基础仍然是不稳定的，不稳固的。从银行来讲，虽然现在报出来的不良率在 2%左右，实际上经济增速继续放缓的大前提下，不良率还会上升。债券市场——大量的企业，最近几年发了很多债，而且价格虚高，很多债的收益率跟国债基本上是一致的，这是不可能的，风险被低估了。股票市场有大量的企业，实际上经营情



况是不好的，但是价格并不低。所以从各个方面来讲，金融的基础是不稳固的。

现在货币存量换成美元已经是 21 亿美元了，每个身份证每年可以转出 5 万美元，6000 万的身份证，就可以把咱们的外汇储备

搞光，所以整个基础是不稳的，和历史任何时期相比基础都不够稳。

今天的金融与实体经济的关系，比历史任何时期都要复杂。1 亿的股民，5000 万的股民，今年 1 月份的损失，每人 5000 万。我们今

就现阶段而言，中国的比较优势在经济领域，尤其是第二产业（机械制造、通讯产业等）。因此，周边国家是“一带一路”战略实施的重点。而与经济发达、文化领先的欧洲之间的协同合作，不但会有力推动这一进程，还将强化中国与欧洲之间的联系、进一步提升中国的经济水平，欧洲的市场、技术、多边合作理念与经验，都是中国所需要的。

“一带一路”下的中欧合作如何双赢？

■ 薛力
中国社科院世经政所国际战略室主任

近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捷克，再次让人关注欧洲在“一带一路”中的角色。“一带一路”倡议/战略是新一届中国政府对外关系的顶层设计，将在未来 8—10 年统领中国的对外事务。基于中国的综合实力与全球影响力，任何大国都难以忽视这一战略。美国加快推进 TPP、强化在亚太的军事存在与此有关；印度的季风计划与香料之路计划，日本的亚洲基础设施建设资助计划，应对“一带一路”的味道甚浓；俄罗斯的反应是，同意欧亚经济联盟与“一带一路”对接。那么，作为全球发达经济体聚集区的欧洲，没有理由例外。身为欧洲的代言人，欧盟还在摸索应对“一带一路”的系统方案。擅长多边主义的欧盟也愿意倾听一个中国战略研究者的相关思考。

一些学者认为推行“一带一路”不过是“消化外汇储备、化解过剩产能、多交几个朋友”，这种观点显然有失片面。对中国来说，这是中华文明与欧洲文明之间，第一次由中方发起的有计划的沟通与对接（元朝是蒙古帝国与中华帝国的交汇点，在中华文明中不具有代表性）。华者，花也，引申为最发达的部分。在两千多年里，中华文明整体上一直是东方文明的核心部分。以此为基础，诞生了以中国为中心的天下体系。费正清等西方学者着重从经济与贸易视角揭示这一体系，将之概括为朝贡体系；而以黄枝连为代表的一批东方学者则从文化特色角度把握这一体系，将之称作天朝礼制体系。还有一批东方学者（也包括笔者）则认为，从权力等级、经济发展水平、文化成熟度等方面，倾向于使用华夷体系（或华夷秩序）这一概念。这一体系与欧洲的情形不太具有可比性。如果一定要比较，则显然迥异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建立后的欧洲，相对接近于中世纪之前的欧洲，尤其是查理曼大帝统治时期的欧洲。

中华文明有文字记载的起点很可能是《易经》，以后发展出道家、阴阳家，墨家、儒家等枝干，结合佛教还产生了禅宗等枝干。较小程度上中华文明还包括大乘佛教、法家等分支，以及萨满教、回教、土地公崇拜、妈祖崇拜、关公崇拜等领域性或地方性文化分支。这些文明的影响主要限于东亚地区。近代以来，滥觞于《威斯特伐利亚和约》的民族国家体系向全世界扩展，天下体系坍塌，中华文明不断被侵蚀，中国长期处于向民族国家转变的进程中。蒋介石时期的中国与毛泽东时期的中国大致上都处于这个“历史三峡”中。明治维新后的日本，尝试在东亚地区族群群建立或转向民族国家的过程中，扮演中国国家的角色，但二战的结局意味着这一尝试失败。战后的日本转而追求经济领域中的“中华”地位。日本获得了成功，东亚经济雁型模式的形成是典型标志。1980 年代日本一国的 GDP 远远超过了东亚其他国家 GDP 的总和。

改革开放后的中国，聚焦于融入世界、发展经济。2010 年中国的 GDP 超过日本，2014 年中国的 GDP 大约是日本、韩国与东盟九国（即东盟十国减去马来西亚）总和。而且，中国经济虽然进入了新常态，增长速度依然较高，GDP 可能在未来十年赶上美国。体量巨大的中国的这种巨变，不但改变了自身的定位与认知，对世界的影响也日益扩大。于是，重构亚洲乃至亚欧大陆的政治经济文化秩序，

就成了现实的需求。200 年来，中国第一次有能力、有意愿这么做。但是，以战争方式或通过建立殖民地来实现这一目标，或者重现具有等级差别的天下体系，已经不具有现实的可行性。以和平方式实现上述目标是不二选择，操作上则遵循“提供增量”这种各方都比较容易接受的途径。

“一带一路”战略就是这种思路的体现。体现中国的自我认知已经从“东亚国家”变成“亚洲中心国家”与“亚欧大陆东端的大国”，并希望从“有世界影响的地区大国”变为“综合性全球大国”。就现阶段而言，中国的比较优势在经济领域，尤其是第二产业（机械制造、通讯产业等）。因此，周边国家是“一带一路”战略实施的重点。而与经济发达、文化领先的欧洲之间的协同合作，不但会有力推动这一进程，还将强化中国与欧洲之间的联系、进一步提升中国的经济水平，欧洲的市场、技术、多边合作理念与经验，都是中国所需要的。

对欧洲来说，这是与中国建立强大的政治经济文化纽带的重大机遇。大约从哥伦布发现新大陆起，欧洲成为全球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。文艺复兴、宗教改革与启蒙运动三大思想运动为欧洲的崛起奠定了思想、文化与政治意识形态基础，资产阶级革命因而得以在欧洲发刎，而资产阶级革命为欧洲的崛起做了政治上的准备。

宗教改革触发了基督教新旧教派之间的大规模战争，即被称作宗教战争的三十年战争。战争的结果是，分属新旧教派的一些欧洲国家之间签署了威斯特伐利亚和约，它为政教关系与国家间政治关系做了新的安排，标志着世界历史从帝国时代开始向主权国家时代转化（进而以法国大革命、美国独立战争等作为标志，世界进入民族国家时代）。这场战争是神圣罗马帝国的催命符和荷兰王国的催生婆。三大思想运动特别是启蒙运动，海外贸易与殖民地扩张，圈地运动，手工厂技术积累，共同催生了英国的工业革命。工业革命在欧洲的扩展则使得欧洲成为世界经济的发动机。强大的经济与军事实力使得欧洲成为世界中心，在欧洲（特别是中西欧）流行的民族国家因而成为世界其他地区族群追求的国家形式。

但是，民族国家的固有缺陷（如民族利益至上）加上一些国家领袖的帝国野心，又使得欧洲国家陷于两次世界大战。大战让欧洲元气大伤，并丧失了世界中心的地位，还成为冷战时期两极对垒的抵押品。欧洲各国终于意识到，战争只会造成共输，只有合作与发展才能给欧洲人带来和平与幸福，只有联合起来欧洲才能成为世界上有影响的一支力量。欧洲和平整合进程至此真正开始。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努力，现在的欧洲已经是全球一体化程度最高的地区，成为全球地区整合的样板。就经济总量而言，2014 年欧洲国家总和为 14.5 万亿美元，略少于美国的 16.9 万亿，多于中国的 9.9 万亿。

但是，美国已经步入比较强劲的经济复苏。处于快速工业化、城市化进程的中国依然有保持较快经济增长的潜力，如果不出意外，经济总量很可能在几年后超过欧盟。而欧洲经济则尚未从 2008 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中复原。由于财政整合落后于金融整合，政治整合进程缓慢，国家依然在欧洲的经济与政治生活中发挥强大的作用，一些国家对欧盟进一

步整合心存疑虑，加上人口老龄化，这些因素的协同作用，使得作为成熟经济体的欧盟，经济发展潜力难以与比肩美国，更难与新兴经济体媲美。欧洲在全球政治经济中的地位有进一步下降的危险。欧盟发展独立防务力量的努力更受到北约的掣肘。环视全球，与中国的合作无疑是一个现实的选项。毕竟，在升级改造西欧老化的基础设施、推进中东欧的经济发展、推进欧洲独立防务力量、提供商品与技术市场等方面，中国都可以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。

就中欧关系而言，双方也存在强化合作的必要性。近两百多年来，欧洲一直在双边关系中占主导地位，通过软硬两手，让中国体认到了什么是现代性，尤其是思想、文化、科技、军事等方面。中国作为适应者与学习者，直到最近几十年，才算摸到了自身走向现代化的途径。经过几十年的全力建设，中国首次有能力向全世界提出一项实现和平崛起的对外综合战略，即一带一路战略。中国的欧洲政策，将在这一框架下实施。现在规划的六大经济走廊中，至少有两个（中蒙俄、新亚欧大陆桥）以欧洲为目的地，西欧更是渝新欧、蓉新欧、汉新欧、西新欧、郑新欧、义新欧等多个国际班列的终点。欧洲参与到“一带一路”中，意味着欧洲理解了中国现在的对外关系“纲领”，并对其加以支持。这意味着双方走向了全面、平等的合作。西欧国家中，英国目前这方面做得比较好。

欧盟毕竟不是单一国家行为体，不大可能像美国那样推出亚太再平衡战略，或者像中国那样推出“一带一路”战略。但这并不意味着欧盟不能有所作为。美国在亚太再平衡战略框架下，经济领域针对亚太地区推行 TPP 的同时，针对欧洲推出了 TTIP。虽然进展落后于 TPP，但没有人怀疑，TTIP 最终也会达成。这一进程主要取决于欧洲国家间对自身利益的协调。毕竟，基于共同的文化传统、经济联系、政治偏好以及军事纽带，强化跨大西洋经济关系符合欧洲的利益。而 TTIP 的高标准，也有助于强化欧洲在全球产业链中的优势地位。那么，针对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，欧洲应该如何因应？需要另外找一个“帽子”么？

据说欧洲对一带一路战略抱有疑虑，甚至建议中方不要使用“战略”一词（这或许是中方现在不时申明“一带一路是国际合作倡议”的原因之一）。出于本能、价值观、不习惯等多种原因，欧洲的反应可以理解。但欧洲文明的显著特征是“捧着圣经追求商业利益”（或叫“左手圣经右手商业利益”），而且，作为国际政治中经验丰富的行为体，欧盟及其成员国显然清楚与中方合作的必要性，而不会太在乎这种合作是否有一个称心的“帽子”。并且，当价值观与巨大的利益不能兼容时，对利益的考虑通常占上风。欧洲主要国家过去几年的对华政策都凸显了这一点。既然欧洲不能编织出更好的“帽子”，不妨在一带一路框架下进行合作。毕竟，重要的不是中国是否使用“战略”一词，而是中国在推行“一带一路”的过程中，是否让欧洲切实获益。然乎？

那么，“一带一路”下的中欧合作在哪些方面可让双方获益？除了前面已经提到的中欧各自从对方可获得的益处外，至少还有以下三点。

推进亚欧大陆与其他地区的发展。从现代性的角度看，亚欧大陆大部分地区仍处于建构民族国家、推进经济与社会发展的进程

天的金融跟国际关系极其密切，去年 5 月份股份下跌，8 月份汇率改革波动，加上今年 1 月份股市下降，每次都带来了国际影响，每次都跟汇率贬值压力相互作用，恶性循环。我刚才讲的是实体经济和金融关系非常密切。

另外现在的保险、信托、银行、股市资产实际交互程度非常复杂。股市下降的时候，整个资产情况会直接影响我们实体经济的融资成本，怎么办？我建议有三点。第一明确提出稳金融。稳金融是指宏观上的金融，包括资本价格。资本市场整体的股价要有明确的目标，要有机制，要稳住。比如说宣布，如果市盈率降到 10 倍以下，必须有一个机制，学香港地区 1998 年的时候，怎么退出；价格回来以后，基金赚了钱以后，要按香港地区的方式返还给股民，或者进入社会保障金。这是稳金融，稳市场的第一件事。

第二件事，加快基础性的整顿工作。比如

说一些要破产的企业，债务上就要重组，再比如说很多的银行呆账、坏账，在整体金融稳定的情况下，鼓励它赶紧重组。整体的稳定和微观的调整是不矛盾的，是相辅相成的。

第三件事，稳汇率。非常坦率地讲，我个人观点，这一轮，此时此刻汇率改革的窗口已经关闭。汇率改革需要窗口，需要外部对你的汇率观点比较一致，而且没有大幅度贬值的情况下，资本账户逐步打开增加，汇率弹性是有时机的，现在这个时机已经过去了。未来一段时间，我的观点以稳定为主。因为汇率市场在一定程度上是一个多余的价格，相当于盲肠，此时此刻影响汇率走势主要来自于金融方面，这个方面，汇率以稳定为主，千万不能产生进一步贬值的巨大压力。

三件事搞好了，金融就稳定了，金融稳定了，我们产业升级和经济结构调整就有希望了。

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

■ 郑秉文 中国社会科学院教授

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提出的分量是很重的。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继续提出来，社会缴费的下降——2015 年已经下降 3 项社会保险的缴费。2016 年有两项需要下调，一个是养老，一个是医疗。

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，从三方面给我们重大的启示。**第一，引入成本概念，强化投入产出的意识。**从需求侧的角度来看，这么多年来，我们始终把它看成和谐社会，看成是需求，看成是一种福利，而没有把它看成能够影响企业竞争力，影响经济增长的生产要素，这就是从需求侧判断它，看待它的一个重要的区别。社会保障制度是一个双刃剑，要这样看的话，应该建立好多相关的制度，比如说是不是积累越来越多也好，我们是不是像美国一样设立一个基金率，是明年支出的百分之多少，是 300%，100%，还是 150%，不是越多越好。

第二点，要引入结构性改革，强化持续性的意识。长期以来，我们的制度存在很大的问题。比如说从养老保险制度来看，每年正常缴费支出几乎与正常养老收入是相等的，每年节余这么多主要来自于财政转移支付。失业人员保险制度是有问题的，基金规模越来越多，受益人数越来越少，下降了一半，势必要加强企业的负担，大量失业人员没有失业保险，企业主必须支付一次性的赔偿，增加企业的负担。失业保险的制度存在一些问题，需要改革这些问题。再比如说工伤保险，10 年之前受益人数 50 万，现在是 200 万，10 年之前之类是 240 亿，现在是 1400 亿。现在有条件，应该把它提高成省级统筹。从供给侧来看，应该强化可持续性的意识。

第三点，要引入制度供给的概念，强化底线的意识。中央经济会议提到社会政策要起到兜底的作用，从兜底的作用来看，这种制度的政策供给与需求还是不一样的。制定什么样的社会政策，社会就应该接受什么样的社会政策，而不是完全跟着需求走的，福利的需求是没有尽头的，它是跟设计有关，由此强调顶层设计，一篮子设计。

社会保障制度改革要凝聚共识，要讲三中全会，讲中央经济工作会议——三中全会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是一脉相承的。楼部长讲的谈判的问题，宋晓梧也强调了这个问题，我讲的社会福利制度比较，这里面涉及到谈判，工商谈判是 1，部门谈判是 2，中央部门的谈判是 3，OECD20 个国家，谈判的层级确实是不一样的，南欧是高的趋向 3，北欧也是高的。重要的区别是什么？谈判如此高的国家有两个趋势，一个是改革容易发生一致，像瑞典，还有一个趋势改革不容易达成共识的希腊。谈判趋势如此之高好处，也有坏处，关键就是引导。撒切尔夫人上台和里根上台在美国降低了谈判层级，从国家层级往下降，在美国国家三级谈判越来越少，二级还有一些，主要是一级谈判。三级二级主要是欧洲，主要是南欧和北欧，这两个地方都是极端，关键就是劳动合同法的判断。2008 年实行的劳动合同法确实是有问题的，民粹主义还是非常盛行的。